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一〇期 ——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210c)

---

- 【研究评论】以真实的文革史昭示后人 徐友渔  
【文件选载】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文献资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16日) 陈伯达  
【会议实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4——28日)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五) 周孜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研究评论】

以真实的文革史昭示后人

• 徐友渔 •

从1949年到1989年，中国大陆历史中最为怪异的事情之一，就是一方面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清洗、镇压、杀人、处决，另一方面真实发生的事件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几乎不留痕迹，当事人和目击者缄口不言，史书中一字不提。唯一留下的，是官方的宣传、歪曲和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承认的，但文革中曾经发生多起大屠杀，这却是许多人不知道，也是可以空洞地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的官方史学不愿面对的。宋永毅君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将中国当代史中最残暴惨烈、令人不忍卒读、同时又被掩盖的一页展现在读者面前，就宋君而言，这是对中国史学和历史本身的一大贡献，对大陆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重新审视民族的罪孽和良知的契机。

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视无睹，这是另一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一重耻辱。

中国人的心灵似乎不适宜在善与恶的绝对性和对立之中作沉思和反省，我们宁愿苟安于当下的日常生活而不愿正视过去的苦难，当需要弄清事实、明辨是非、追究责任时，我们惯于以“不堪回首”相搪塞。尽管如此，掩埋历史的罪责不应该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寻找，因为人们的淡忘不仅出于心理上不能承重，而且是受到压制、威胁，感到恐惧。在中国，说出真相是再困难不过、再危险不过的事。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官方不是也对文革作全面否定吗？”是的，官方曾经有过这样的表态，但那只是在“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晚期左倾错误路线”同时又要“坚持和捍卫作为革命的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的一种表态。不错，大陆也批判过文革，但从来没有涉及到最根本的问题即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尊严、个人财产权，这些权利在文革中被践踏无遗。大陆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本书记述的事实发生时的同一政权和同一制度之下，所以，一个最著名的左派理论家在反对批判文革时一语道破天机：“说到底，文化大革命毕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污点。”

文革中发生大屠杀，并非偶然事件，并非文革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失控产物。杀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文革中残忍地杀人、满门操斩、大批地屠杀，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和心理上的支撑，没有物质条件，没有制度的保证，是决不可能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成了民族的意识形态，其特征之一就是漠视生命。毛泽东多次说——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说——核战争并不可怕，全世界二十几亿人，死掉一半，埋葬资本主义，剩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有什么不好？毛把文革说成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大革命，而他领导的上一次革命，以三千万人的生命换来一个新政权，这一次他又准备以多少万条生命贯彻他的意志、实现他的目标呢？我们不知道毛的具体打算，但毫无疑义，他对成千上万地死人毫不惧怕，就像他对几年前因为他忽发奇想而导致几千万人饿死而不为所动一样。相应地，受他蛊惑的文革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也不会在鲜血和尸体之前却步。

我在自己的文革研究著作中有以下文字：

1968年5月，陕西省某县发生第一次大武斗，一派红卫兵组织用步枪和迫击炮打败对立派，对方死50来人。战斗结束，当胜利者看到遍地死尸时，吓得心惊胆战，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本派一个成年人提醒因开杀戒而手脚无措的学生：“打得好！必然要打，毛主席刚有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学生们一听，立即从惊惶不安变得理直气壮，原来自己打死人属于打国民党！于是开庆功会，颁奖受奖。我的被采访者告诉我，心理上越过了这一关，以后做什么事就无所顾忌了。

毛泽东对于文革中大批杀人不仅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且命令军队“武装支持左派”，文革中许多地方发生军队向群众开枪事件，就是在“武装支左”的指示和口号下进行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命令军队发枪给一派组织，使其得以放手对另一派实施武装攻击，也迫使这一派从别的部队或兵工厂搞到枪支弹药，以杀人对杀人。对此，毛泽东轻松地、甚至兴高采烈地称之为“全面内战”。

文革中的大屠杀是描述文革、研究文革和评价文革回避不了的话题。当这方面的史实披露出来之后，一切对文革的辩解和美化都站不住脚了。

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为了实现其平等理想而作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失败了，但毛的出发点应该肯定，文革精神将永放光芒。凭什么应该相信毛有如此高尚的理想？年轻的左派引证毛的语录，引证文革中《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及文章。但是美妙动人的言辞能够遮盖尸骨和鲜血？难道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可以根据当权者的自我标榜和宣传？果如此，希特勒的辩才和鼓动力比毛泽东不知要强多少。退一步说，如果实现一种社会理想带来的是大屠杀，这种理想的价值何在？如果有人愿意为这种残忍的理想捐躯，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想让成千上万的人当牺牲品，那就未免太异想天开了。

有人说，批判和否定文革不过是站在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立场上发言，文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遭到冲击的多半是当年养尊处优的官僚和待遇不错的知识分子，老百姓并不是受害者。

但看过本书之后就可以明白，在文革中遭到屠杀和其他形式虐待的，首先是文革前生活悲惨、地位低下的人，即被划为异己分子的各类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而屠杀者、施虐者除了军队，就是政治上可靠的民兵、各种红人、积极分子，特别是掌权者的子女。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自己就是片面的历史知识的受害者，他们不知道文革中的大屠杀和类似的事情，不知道杀人者、施虐者和被杀者、受虐者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所阅读的只是文革后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回忆与控诉，他们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东西，这是不错的，他们错在把这些东西当成了文革的全部。

有个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他没有经历过文革，在美国读书和任教，在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祭日发表文章说：“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我希望他认真读读《文革大屠杀》这本书，想想文革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发生的一切，再考虑自己还能不能坚持希望“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无知或一相情愿使人天真，天真有时显得可爱，但天真到为浩劫辩护，挖空心思寻找其中的“合理因素”，就不知其用心何在了。

我知道，在出版《文革大屠杀》一书的同时，由宋永毅君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也将出版发行，这是多位学者为海内外了解和研究文革呕心沥血、耗时多年才完成的基础工作。我希望宋君及其合作者再接再厉，为复原和再现真实的历史继续作出贡献，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关注、支持这项工作。

□ 作者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

~~~~~

#### 【文件选载】

####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列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领导过份强调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把束缚群众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办事。要充份发

扬民主，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做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大多数学生是革命的，是好的，他们是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的，他们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要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掌握林彪副主席对领导干部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来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过去军委、总政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联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规定，选举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构。为完成斗、批、改的光荣任务，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是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照本宣读并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附：中共中央的批示全文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的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地宣读，并坚决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

## 【文献资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16日）

• 陈伯达 •

（一）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宣告失败。

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同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毛主席三次在天安门接见群众和国庆节的检阅，群众的规模之大，声势之盛，在中国，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同那么多的群众见面，亲自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在一起，说明了他总是信任群众，同群众共呼吸，共命运，给全党同志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同志们要晓得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再学习。

两个多月以来，即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了解，斗志更加昂扬，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发展。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疑地说，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恐惧、痛恨和忧虑，而许多庸人人为之目瞪口呆。

##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在这样大好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会自然消失了吗？不。它并不会自然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就已警告我们：“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份人不愿意实行”。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

从我们党创立以来，就有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不同时期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中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而在遵义会议后取得全党统治地位的路线。这一条红线贯串着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但是，正如毛主席经常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总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的。因此，“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还总是企图干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

有些人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一些同志还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在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便于推行那条错误路线罢了。

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他形式来代替。例如，在一些学校、机关中，有那样的人，他们完全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暗中操纵，成立所谓“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组织。甚至当各地大量的革命师生来到首都见毛主席的情况下，也有的地方组织一小批人跟着前来，宣传自己反对中央十六条的决定，企图打击那些来京的革命师生。

九月二十五日，我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些同志接待一批各地来的学生，曾经有个建议：如果高干子女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兵和普通干部的子女来担任。我个人认为，在有些学校，有些单位，高干子女一定要掌握领导地位，是没有好处的，对我们将来的革命事业不利，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当然，如果高干子女的确很好，群众的确拥护他，要选他，我也不反对。我这个建议是否恰当，还可以商量和斟酌。但是，我们调查的材料说：有的人就很快采取对付的措施了。他们说，“中央已有指示（并没有这个指示），高干子女不担任红卫兵领导，趁群众不知道，要争取主动”。于是就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辞去了职务，指定了他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去接替。

坚持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的花样是很多的。但有些同志，对这类花样，却津津乐道。这是很错误的。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但是，有一些人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置之不理，还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和行动中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的前夜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确是这样，原来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一些人，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就站在同革命对立的方面去了。

先进的变成落后，落后的变成先进。这类情况，在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而只是想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的、无限的威信，动员一小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保他们。这次会议印出了四川南充一个妇女受到压力的材料，我建议大家，不妨仔细读一读，从那里受到教益。我就在这里引出两段话吧！

南充那位妇女对两位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都是搞反革命工作，那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如果出这么多的‘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是有问题。”

大家听着！这位普通妇女说的话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鲜明呀！

同一材料，又写了一位退休工人的谈话如下：“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也不是国民党的地委，革命的地委为什么还害怕群众，又不是旧政府；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没有保住……”

大家听着！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的多么明明白白呵。

他很领会毛泽东思想。他比起我们某些干部高明得不知道多少倍。

事实是这样摆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这种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八月八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过十二天的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指谭力夫——编注）就跳出来，发表了同中央决定十六条相对抗的一篇讲话，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是，对那一篇同中央决定相对抗的讲话，却视为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位所谓高干子女竟然在称赞的时候，直截了当地宣称：那个讲话“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

高干子女有很多是好的、比较好的，在群众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写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以前是否全国凡属派了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之后，各地都在对待大串连、多数少数关系等问题上，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否都要承认是继续执行了‘反动的错误路线’？”我想，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错误路线的认识和估计问题，对待消除错误路线影响的问题。我不妨在这里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我的看法。

第一，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第二，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第三，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的学生，这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当然，其中有自觉执行的（这是少数的）或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大量的）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之分。

第四，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第五，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

第六，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例如，对待大串连，对待所谓少数多数，对待所谓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他们都有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问题。

第七，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不是说，执行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也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类干部。必须说明，即使原来称为一类干部，犯了这种性质的错误，也必须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

第八，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说来，他们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对这样的同志，要根据毛主席从来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但是，大家都要有高度的自我警惕。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第九，受错误路线蒙蔽和影响的群众，或者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和影响的一些群众组织，并不担负错误路线的责任。大家不应该歧视他们，不要给他们扣什么帽子，而是要善于同他们商量问题，善于同他们交换意见，争取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路线的危害，帮助他们认识那些幕后控制他们、操纵他们的人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这场考验。现在还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后还将长期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众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无所畏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的负责人，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

可是，有些同志，直到现在，还是“怕”字当头。有的人，甚至怕得很厉害，怕得很古怪。而且，运动越开展，怕的花样就更多了。

怕字派说，群众乱来，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

怕字派说，群众把他们习惯的秩序打乱了，使他们的事情不好办。

怕字派说，文化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革命，生产就只好进行了，生产计划就没有保证了。

怕字派说，文化革命起来，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会翻天。

怕字派说，闹文化革命的，特别是那些闹得厉害的，大多是一些不安分的人，“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

他们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罪名，不少头衔。



于是，他们怕见革命群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大字报上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串连，特别是怕大串连，就有理由了。

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有理由了。

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估计来说，有些同志是想做现状维持派。但是，有那么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造成条件。应该引起这些同志高度警惕：历史上有些人，就是从害怕群众走到镇压群众，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不要重蹈这种复辙。

当然，有些同志原来在口头上并不反对群众运动，也不反对发动群众。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毛主席讲过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是好龙的，到处画了许多龙，一旦真正的龙出现，他就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毛主席讲这个故事，已经过了四十年，难道我们还不要引以为戒吗？

德国有个著名诗人，海涅，进步的人物，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自认是共产主义者，却极其害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这样说过：“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我是用一种忧虑的、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可是一一唉！这决不是伪装！当真，我想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以海涅看，一旦共产主义革命到来，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所喜欢的艺术品就会被破坏，他的诗歌集也会被毁灭。他说，“我预见了这一切，而我每想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用来威胁我诗歌的毁灭情形，我总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我的诗歌将随着整个古老的罗曼谛克世界而沉沦了”。虽然海涅说他还是赞成共产主义的，他愿意旧世界崩溃，愿意这个纯洁沦丧、利欲嚣张、人剥削人的旧社会遭受彻底破坏，但他把无产阶级看成“无知”，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就不能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宁可说，他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将破坏旧社会剥削阶级所流传的腐败思想，腐败文化，腐败风俗，腐败习惯，另一方面还将保留历代人民所创造的文化的精华，而且必将创造出为过去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灿烂的文化。

在座的同志们大概都不是文学家，不担心有什么诗歌集会被毁灭，可是，冒昧地说，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有些同志所担心的，或许比海涅更糟糕些。有的担心会丢掉乌纱帽，有的担心会丢掉“尊严”，……等等。为了这种种担心，有些同志就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抵触起来了，就同革命群众抵触起来了，就煞费苦心，搬出各种手段，不论硬的或软的，都用来对付革命群众了。有的甚至动员一些不明白真相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分化一时弄不清是非的学生，标榜多数群众拥护自己，标榜自己主持的机关是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触动他，就要整谁，以至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说，这不过是辩论而已，不能说是围攻。

有的同志提出，辩论和围攻的界限究竟是什么？什么是辩论，什么是围攻？其实，只要我们的屁股坐在革命群众一边，真正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懂得的。如果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尽在怎样对付革命群众的问题上打主意，那末，谁也不能代替他们来回答这个问

题。

对待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

让革命学生互相串连，这是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他们在串连的革命大熔炉里，受到各种锻炼，在串连中去辨别大是大非，在串连中去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其意义是很深远的。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得以互相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串连就是学生们最大的、最好的学校。

可以提倡串连的学生步行，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演习长征。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大连步行来京的学生，就是根据毛主席这个思想做的。这样的人就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像那种只从家门到校门，随后就到机关门，这样的人，难道就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吗？

有人说，全国串连妨碍生产。但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我们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好，工业以很高的速度上升，粮食棉花也比去年增产。中央提议，串连的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不坐火车、汽车和轮船。一定会有很多的学生这样做。这么一来，工农业产品的交通运输，不就更好处理了吗？

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家都说要当毛主席的学生。请看看，请想想，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是怎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吧。

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不多说。

红卫兵，刚刚露苗并且还遭到摧残的时候，是谁起来支持红卫兵呢？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在八月一日，他就向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个月短短时间，在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支持下，一小批的红卫兵竟然在全国发展为惊天动地的广大青少年的革命队伍。一切牛鬼蛇神看到他们，就发抖起来。有些怕群众、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他们心里想，最好是取缔，至少也要纳群众运动于他们安排的所谓“正轨”。

红卫兵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做了许多好事，还提出了许多好倡议。对于红卫兵的倡议，大家都应该重视，认真研究，把能够做的，付之实施。

各地红卫兵的战果，必须开展展览会，以便充份暴露那些公开的和暗藏的牛鬼蛇神，用事实来证明革命造反有理，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后代。

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在观察了我们的红卫兵运动以后，曾经论断：“红卫兵到现在，约有两个月的历史，但是它已经成为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政治生活中永久性的固定组织。他们大概会影响中国人未来的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

这家通讯社还说：如果西方世界或是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是短暂的热情”，这“不仅是愚蠢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敌人的观察，实际上比我们一些不懂事的同志还要清楚得多。这点值得我们同志好好地想一想。

本来是我们祖国自己的事。为什么敌视我们的那些外国人，会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呢？十分明白，现在已经不是所谓什么“锁国”的时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声气，总是相通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正在波及全世界，激动各国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同样，十分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使我国人民的思想更迅速、更高度地革命化。不论什么地方，什么单位，只要认真地而不是马虎地，严肃地而不是草率地，抓好文化大革命，就必然大地促进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使我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能够更有力地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

那些敌视我们的世界反动力量，感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十分”危险，道理就是这样。

敌人害怕的事，我们就要努力去做。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广大工农群众，广大青少年，都必须掌握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注意“决定”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一面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的岗位，努力尽自己的最大革命义务。

####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主席说，革命“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毛主席说，革命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这些是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和对象有变化，但是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的一般原则，在各个时期都是适用的。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样适用。

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这种阶级路线，善于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即真正的左派队伍，没有括弧的左派队伍，同时，要争取那许多动摇不定、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份揭露那些顽固抵抗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一心玩弄权术的两面派。

最近一个时期，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完全不理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不同政治立场，也完全不理睬各种派别都是带有政治性的、阶级性的，都是代表这种或那种社会思潮的。他们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投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

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毛主席和我们党从来都是特别重视人们的阶级成份、阶级出身的。同时，也反对“唯成份论”。

青少年都必须在阶级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明自己的世界观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正如毛主席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的思想，不是先天生来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在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是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是反映那个阶级。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领导人民大众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目的，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露了阶级社会的秘密，特别是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我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一个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有极深远意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这一学说教育全党，教育群众，时时刻刻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高度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要防备修正主义者篡党、篡军、篡政的各种阴谋诡计，防备国家变色。很明白，在阶级问题上，我们一点都不含糊，都不能含糊。我们是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我们的观点，同那些唯心的血统论者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工人阶级按自己的社会地位说来，是最革命的，最容易热爱科学社会主义、担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是工人运动自发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们创立的思想，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他们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先进思想的成果，特别是总结了国际工人阶级斗争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因而创立了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不断前进。

有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接受资产阶级的贿赂。比如，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是工人，但后来却变成工贼，他们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和其他各国，也有一批是工人出身或者干部子女。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实际上，这种血统论者是否认自己需要在革命前进中不断接受改造，否认别人在群众革命运动中能够改造自己。换句话说，他们自己不愿意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不重视阶级成份，阶级出身，是很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很错误的。这些错误观点，必须批判。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所谓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塞维克在苏维埃中曾经是少数，而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是多数，但布尔塞维克的伟大领袖列宁恰恰是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俄国人民的大多数，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恰恰是代表反革命，代表一小撮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多数是暂时的，虚假的。

我们党的历史也同样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党中央曾经处于少数的地位，但恰恰是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那些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代表人物，虽然曾经在党中央拥有暂时的、表面上的多数，但终于一个个地失败了，垮台了，被群众抛弃了。

不做阶级分析，自称处在“超然”地位，不分左中右，既不支持这边，也不支持那边，不偏不倚，公公正正。但是，形势逼人，非此即彼，总有一偏，不偏无产阶级，即偏资产阶级，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所谓不偏不倚，也是表面的，虚假的。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在八月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上指出：“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接着，毛主席又指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路线，要我们注意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的策略，叫做孤家寡人的策略，叫做依靠单兵独马的策略。而无产阶级的策略相反，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就将浩浩荡荡地前进，冲破一个一个的阻碍，夺得一个一个的胜利。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没有疑义，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必将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腐败东西而代之。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必将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

## 【会议实录】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4——28日）

◇ 10月24日毛泽东讲话

毛说：“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有打你们。大家就是不检讨。伍修权家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

毛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回答：“回去看看再说。”毛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毛问周恩来会议情况，周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问李井泉：“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太通，会后一段较好。”

毛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住去，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毛说：“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贯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问李先念：“你们今天开的怎么样？”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讲：“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讲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

毛说：“你也告诉他们一下，过去的‘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有点精神不足。”

毛说：“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说：大权旁落。）毛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哭，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给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到华北，还比较

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相互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结果。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啦，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都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固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乾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到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耻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共产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哪？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插话：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人负责。”

毛还说：“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 10月25日毛泽东讲话，全文如下：

讲几句话，两件事。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做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么是太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廿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

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奇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不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经过两个月，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阶段就比较顺了。只有五个月，运动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一九二一到一九四九，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路也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么。社会主义革命已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前几个月，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就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也有大量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要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的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了。现在看来，还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单位没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搞交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以后几十分钟话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让另一派红卫兵保驾，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罗，不能过多的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讲两件事。第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急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来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再打倒你们！我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讲：“没想到我们老前辈为什么怕红卫兵？”还有伍修权四个孩子分成四派，有的同学到了他家里来，有时一来就好几十个，有好处。我看小接触很有好处，大接触，一百五十万几个钟头就接触了，也是一种方法，各有各的作用。这次会议简报很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年，会议以后好一些。还有哪个讲？今天就完了，散会。

◇ 10月25日林彪讲话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中间有一些顶牛，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中央有几个领导人，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

“在一个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



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份，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

“我们应该不要怕出点乱子，应该敢字当头，而不要怕字当头。否则，我们就要犯政治上的大错误。”

“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

◇ 10月25日陈伯达讲话

“中央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为什么刘邓路线能在全中国推行呢？这是因为主席外出不在北京，是刘邓利用中央大权在手，篡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变成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就是要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用各种方法把他们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没有人批评他的错误东西。邓这个人凭他的聪明，好像他是天生的百科全书。现在刘邓并没有承认错误，他还要进攻。”

◇ 10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性讲话

周首先就如何传达会议精神进行了布置。并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否可设想一个时间表，各省市机关的运动，设想春节前告一个段落。另外，周还就有关政策和措施回答了几个问题。关于大串联，周提出提倡全部徒步，可搞行军式的。关于红卫兵问题，周指出，红卫兵还是学校的红卫兵，学校以外的农村生产队、城市的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一般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起来的可以保存一段时间不发展，不串联，看看前途。周还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深感跟不上主席。我和红卫兵讲民主集中制。我和他们说，你们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是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坐火车不要钱的权利，你们的民主真不少啊！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大民主啊！总还要有一部份权利集中在毛主席手里吧！至少有三条：一是不准动解放军。二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三是不要干扰新华社、电台、广播、电视台、报社等宣传机关。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不能罢，你们自己的领导可以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不能罢官。扣人、抄家不能搞。也不能打人、体罚。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五）

• 周孜仁 •

（续上期）

## 22，我的记忆中的死者

我的印象中，重大在武斗中共死亡31人。查阅1967年8月28日出版的《战报》第

37期，编辑部文章“活着的八一五要报仇”后面曾有一“急告读者”，说是“决定出版《青年英雄的壮丽史诗》”，希望这些“烈士的亲友和同志们多多给我们提供材料和投稿”。后来，我们确实收集到了很多有关死者的资料，照片、同班同学写的事迹、日记、书信等，我把它作了些文字上的整理、编排，又加了按语，集成了一册——只是，书没来得及出版，书稿却在动荡中散失殆尽。因此，我手上已经没有了死者的具体情况记录，连死者的准确数字也说不出。

按照毛的伟大教导：“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这些同学死了，战斗团确实都举行过追悼仪式，尸体下葬时，都向天空鸣了枪，让那时候非常紧缺的子弹炸出惊心动魄的一片乱响，为死者送行。后来，1967年的大规模武斗结束后，确实还在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差的“烈士陵园”。松林坡是学校紧靠嘉陵江的一座山坡，教授住宅区。坡上满是密密的马尾松，而山头，有一片开阔宁静的草坪，还有小亭一座，灰柱灰瓦，很有些幽情野趣的。假日，共青团员们都喜欢来这儿过组织活动，在霍霍作响的松涛中唱歌，朗诵报刊刚刚发表的抒情长诗。1967年秋天，没有死的同学就在草坪中央挖了一个大坑，将被枪弹打死的同学尸体一具具窖下去，埋上黄土，将校园内民主湖周围的石栏杆拆掉，抬上山，为墓地砌成了围栏。坟前立了纪念碑，还在进口处竖了很大一面诗屏，诗屏上刻着毛泽东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另外，纪念碑上刻了“革命英雄永垂不朽”的字样，还镌上815火炬的图案，和一篇碑文。碑文是王益富写的，而那个流传很广的815火炬图案，则是编辑战报时我设计的一个题花。大概图案比较简洁鲜明吧，又比较好画，很快被广为采用，成了八一五派得以共识的徽记。

几年后，我因一个意外机会读到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关于那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符号的出现，作者曾有一段专门叙述。文章说：“他（指希特勒）看到，纳粹党所缺少的是一个能够表达这个新组织的主张，打动群众心灵的徽号，一面旗帜，一种象征……群众必须要有一面明显的旗帜来随之前进，为之斗争。”于是希特勒绞尽脑汁亲自设计了那个可怕的图案作为纳粹的党旗和党徽。读书至此，我暗自忍俊不禁。我只不过在一个偶然的会偶然地画出了一个图案，没承想，后来竟然成为了一个派别的徽记，更没承想，这个现象，竟应了历史上一段可怕的政治斗争的规律。

又过了几年，我回母校造访，重新登上苍树迷离的松林坡，这时，天正下着密密细雨。时间是1972年夏天。死去的同学的墓尚未掘除。无语的纪念碑上爬满苍苔。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嘉陵江静静东流。我在潮湿的碑台前独坐良久，感慨无已，随即口占了一首古体诗，其意略为：“千里重归访旧冢，独上松林路，雨蒙蒙。烽烟战旗无寻处，草离离，残碑苔痕浓。/此别难再逢，邀我众冤灵，出冥宫，一江碧涛作琼浆，请共我，醉酒论英雄。”

后来，我果然已无法与这片坟莹再逢。母校那一两个曾经在文革中备受冲击的老领导重掌权柄，他们当然不愿意让这一堆乱草丛生的泥土——此外，还包括在广场上一本正经挥动巨手巍然屹立的钢筋水泥毛泽东，等等——继续刺激他们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神经。于是叫人把它们推了！挖了！毁了！毁它个了无痕迹，毁它个寸草不留，毁它个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又过了二十年，1992年，我因生意上的事情又回到了母校，下榻于松林坡外宾招待所。面前——我发现，正好就是当年的墓地。只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水池，半亩横塘，里面全是落叶和暗淡的天光。我问刚刚成年的宾馆服务员：

“这儿曾经打过仗。你相信吗？”

天真烂漫的女孩拼命地摇头。

“这儿曾经炮弹满天飞，一晚上打几百发炮弹，你相信吗？”

还是摇摇头。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于是我说了，这些都是真的，而且，就是在这儿，在现在水池这个位置，埋了好多好多死人，和你差不多，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冤死的大学生！

这一次，她真地吓坏了，吓得跑进屋里不敢出来。

我终究再也无法弄清楚他们的名字，甚至连准确的数字也难以统计。但是，他们中的有些人，我记得很清楚。

唐世轩、李盛品和董继平就是其中的三个。或许，还应该有点亚伟、刘文举。

我根据资料回忆，第一位死者应当是张全兴。采矿系统三年级学生。1967年7月25日死于化龙桥市工业校之战。但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第一位死者，却是唐世轩。他也死于同一天，死于同一个地方，同一场该死的工业校之战。

唐是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出身工人家庭。独子。很奇怪，我们学校好几位死者，包括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的李盛品和段亚伟，都是独子。大约独子所受到的母爱很容易造成他们的任性和行为上的一意孤行。唐世轩刚进大学，正遇校党委宣传部通知我们美术队要把新闻摄影工作兼做起来。于是我们就悬榜招人：这样，我便认识了唐世轩。我主考，他来报考，他非常得意地带了一大摞照片要我鉴审：全是120相机照出的6X6厘米的生活照。照片主角大约是他女朋友：斜歪在公园的草地上扭妮作态。女孩的相貌十分平常。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是，这类照片，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只能够悄悄藏起来自个儿孤芳自赏的，怎么能恬不知耻地拿出来炫耀呢？真是荒唐！我既然以党的宣传工具自居，理所当然便把他回绝了。再说，他那般清瘦，简直就尖嘴猴腮，我坚信他决不会有什么艺术气质。

但是他决不灰心，依旧常常找我套近乎，理由非常简单，当时学生都穷，拥有一台相机比现代人要拥有一座别墅还难，而美术队有相机，当然是党委配发的——这对唐世轩的诱惑力是毋庸置疑。那是党的宣传工具，非常神圣，我当然不敢对他打开缺口。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他的艺术才华最终提供了展现的机会。造反了。他的性格使他的造反成了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很快在总团宣传部门谋了个梦寐以求的位置，就是摄影。那年头自由得很，更何况他出身工人阶级，底气绝对足。于是他有了专用的相机，不知从哪儿搞来的。九三徒步上京，九一五天安门广场谒见领袖、国庆大游行，我都看见他不知疲倦地跑前跑后，累得大汗淋漓：八一五经营之初的所有活动照片，都出自他的镜头。

815战报成立后，我们的交道就更多了。他常常送些照片要我鉴赏，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将作品刊诸报端。当时制版条件太差，我一直没能给他一个机会，虽然他的热情那么让人感动。我确实也答应过一定给他发表——没承想他却死了，死得那么突然！

事情是打工业校引起的。

重庆工业校位于沙区通往市区的咽喉：化龙桥，而工业校又正好属于反到底的势力范围，对于这颗钉子，八一五自然是必欲拔之而后快。这就有了7月25日之役。进攻中，八方先是死了张全兴，这是重大八一五第一次死人，听说是被守方射手用小口径步枪射杀的。据说凶手还是市体委的一名专业射击运动员，枪法很准的。尸体抬回，举校哗然。从来喜欢出头露面的唐世轩当然憋不住了，断然宣布：我马上去把现场拍下来！我要用镜头揭露砸派开枪杀人的罪行！于是去了。赶得还特别急。据说，出现得十分意外的枪声使进攻方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全

停住冲击，躲在四面的安全地带等候命令。唐世轩去了，看见主楼前面大一片空地了无人影，心中好不欢喜：偌大空地，完全足够他选择一个最佳的拍摄位置呢。于是，他大摇大摆走上了。于是——据说，主楼上方狙击手黑洞洞的枪口正好对准他——躲一旁的同伙吓坏了，一齐大喊大叫要他躲开。可他，他是唐世轩呀！唐世轩是不管这一套的。他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要抓拍这样的好镜头嘞！告诉你，这才是过得硬的历史镜头嘞！躲什么躲？他只管聚精会神地对镜头，调焦聚，拨光圈——还等不急摁下快门，枪响了，就一枪。唐聚精会神对镜头的时候，枪手也正好有工夫认认真真的调整枪口准星，就一枪，正正击中唐世轩额心：他死了。

唐世轩和张全兴的尸体同时放在图书馆，供同学们凭吊。二人的遗体都穿着军装。这些军装当然是赝品，总团不知从哪个纺织厂搞了些黄布来加工的，缝工极其粗陋。给他们的尸体穿上，算是安慰一下殉道者和苟活者焦躁难平的心吧。二人的死相都极可怕，而活着的模样却幼稚得可爱——我们在八月二日出版的第34期战报上刊发了二人的照片，还用整整三个版面刊登了纪念文章，第三版几乎还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了张全兴的日记摘抄，并用他日记中的一句话作了标题：“我要作一个雷锋、王杰似的人”。唐世轩没有留下日记，本来想刊登几张他的摄影作品以为纪念，但烽火连天，交通阻隔，进城去制作图版实在太危险，只好作罢了，仅由“唐世轩烈士生前所在战斗组2111纵队”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纪念，题目是“怒向刀丛觅小诗”。

几十年后才得知，那一仗反到底也死了人。战斗以八一五的胜利而告结束，抓回的俘虏自然不少，都交重大处理了。重大的“卫戍部队”除了将其中少数“首恶份子”扣押待审，其余人等全部用翻斗车运去沙区门户小龙坎，唏哩哗啦倒在街上了事。这事当然也很荒唐而且残忍——现在重新争论谁的死伤更为惨重当然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会这么神圣、这么心甘情愿地举起杀人凶器，对准素不相识的、并无怨仇的陌生人下毒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会这么神圣、这么心甘情愿地从容赴死、暴尸街头？说实话，我甚至更愿意相信仅仅是我们这派死了人，这样更能让我永远保留住那份震惊和悲哀。因为这悲哀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把事实留给历史学家去考证吧。

几十年后得知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在那一场战斗中不仅仅“反到底”动用了热兵器，八一五同样也动了热兵器——我突然想起，这说法确有实据。作为综合性工科大学的学生，重大八一五利用其他院校学生不可能有的知识和条件，很早就开始试制热兵器了。这些热兵器包括：“八一五”式冲锋枪、手榴弹、还有土火焰喷射器等。说土，是因为这种火焰喷射器不过是用普通灭火器的外壳，内部装上一些液体燃料而已，这种改装对于从事科技研究的大学师生虽属“小儿科”，而在仅仅只有大刀和铁矛的战场上，它的出现，威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中梁山战斗的胜利，很大程度是因为八一五方使用了自制的土火焰喷射器。

时间是1967年7月10日，重大301纵队得知反到底武斗队从煤校返回电机厂，便安排喷火手人员及土炮在路旁玉米地设伏，指挥者在房顶上用探照灯和号声指挥。反到底“武斗之花”航锋战斗队先行通过，小伙子们胜利凯旋，士气正旺，排成整整齐齐几路纵队，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矛而前，很像十九世纪欧洲精神战中神气活现的步兵方阵。那势不可挡的架势，神经稍有脆弱，谁见了谁害怕。后来我曾听成都方面的人说，到成都支援八二六的重庆砸派崽儿，就是凭着这种赤膊方阵，就是这样高呼着“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一天之内，兵不血刃，便将“红成”派的几十个广播站端个精光。

且说1967年7月10日这一天，重庆大学301纵队看见“武斗之花”的拼命方阵神气活现挺矛而来，却不慌不忙排成横队，挺直长矛拦住去路，只是个巍然不动。等到“敌军”方阵步步接近，突然，屋顶上一声哨响，横队忽地如门洞开，喷火手Z和H从人群中冲到正中：

灭火罐中的火焰喷射而出——古典兵器遇到现代化，结果不言而喻：“武斗之花”顿时被烧得阵脚大乱，溃不成军，漫山遍野地逃命，大学生于是乘胜追击——据几年后清理文革学生“罪行”的结论性材料称，该战斗烧死对方两人，刺伤轻、重各两人，活捉多人押回重大“处理”。

我曾有幸鉴赏过这类武器，甚至看过某些武器的制作过程，严格讲，这些杀人凶器质量是很糟糕的，比如815式冲锋枪，一抠扳机，子弹没射出，弹簧倒先从枪膛里蹦了出来。更严重的是，手榴弹的引爆时间严重不准——据一位参与制造的同学，姓D的电机系高材生、现四川省某大学教授告诉我——从拉环拉出到爆炸，时间应该是三秒六：这个时间正好足以投掷出去并正好杀伤敌人。可重大八一五自制的手榴弹，引爆时间七长八短，根本无法掌握投弹时间。李盛品，机械系一年级学生，当时著名的“八一五烈士”，就因为这个白白送了命。

李盛品，川北山区考来的农村孩子，喜欢梳偏分头，一看便是那种很土却非常乖巧的好后生。1967年8月8日出版的战报第35期几乎用了一个整版刊登关于他的文章，计有：八一五总团追认唐世轩、张全兴、李盛品三人为“优秀红卫兵、模范八一五战士的决定”，有李的生平事迹简介，有悼念文章一篇、悼词五则、评论“无私才能无畏”等。但我始终想不起为什么偏偏没有登他的照片？那张梳偏分头的照片绝对是送到我们编辑部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当然，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发表在同一版的李盛品日记摘抄：“青年英雄的壮丽史诗”，和“李盛品烈士给一位朋友的遗书”。这封遗书，实际上是他死前写给他女朋友的情书。当时大学生忌讳谈恋爱，所以我们发表时提法上做了如此技术处理。该情书是武斗刚开始时写的，还来不及寄出他便死了。他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回忆了旧社会他家所受过的大苦大难，结论道：“如果没有祖国的前途，一切所谓个人的前途都是骗人的鬼话”因此，他对女友说：“阶级敌人随时都在梦想变天，我们怎能睡大觉？……现在的问题是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夭折的问题。毛主席早已下了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现在是决战时刻，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不怕牺牲”。他告诉女友，“为了制止武斗，宣传群众，掌握斗争大方向”，他将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区去。他没有告诉她去做什么。同学们可是知道的，就是去辅导中学生使用重大的自制手榴弹。对于本校产品的质量：引爆时间他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进行演示时，他让中学生躲得远远的，自个儿拉掉引信，然后将手榴弹握在手上测算投弹的最佳延迟时间。不幸的是，他试验的这一棵，引爆时间恰恰很短：他粉身碎骨了。在那封没来得及发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若有什么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诉家里人，如果我妈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会再活下去。你若有空，希到我家去玩，以免除家里人的怀疑。他们若问到我，你可编些话来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要先想好。/ 你得消息后，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只希你不要伤心过度就行了，不要影响身体健康，要想开些，我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我想，你只要想到这一点，可能心里就会开朗些。”信在刊登之前，曾用大字报的形式先行公布在九宿舍门前，这个故事和抗美援朝时著名作家李准写那个关于志愿军给妻子写信的小说几乎完全一样，让所有读者都感动不已。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总团专门派车派人在连天炮火中把他母亲和女友从遥远山区接来学校参加了追悼会。亲人接来当天我就赶去看了，老母亲一直扑在学生宿舍的桌子上痛哭不止，整整一下午都没抬起过头：我只能看见一部散乱的苍苍白发，那么耀眼而摄人心魄！

董继平的尸体不在墓坑里。他中弹后没有马上死去，一直到了几十年后，他才默默无闻地倒在了四川新津岷江支流一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而无人知晓。他的悲剧恰恰就在于他当时没有痛痛快快地死。

这是由全市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统一策划的战斗。开始是想攻占建设厂——那是一间著名的兵工厂——以获取武器。队伍开都开到了，快要开打了，该厂的内应人员却说他们不知道对方的火力点布置在什么地方？真是荒唐透顶！好吧，反正人来也来了，就去攻攻空压厂吧，空压厂也是个好东西，厂里武器肯定也不少，不攻白不攻。反正有坦克掩护，这回胜仗

是打定了，这就：冲！目标是该厂医院和水塔一带。时间是8月2日。这一仗战果如何现在已无资料可查，但重大死了好几个人却一点没错，我能询问到的，便有谢宗正、陈茂明、张显明、刘问举。在向水塔前冲的路上。董继平的钢盔被子弹击落，接着子弹便从他的脑颅斜穿而出——他没有死，甚至没有成为植物人，经过相当时间的治疗，他活了下来，会吃饭、会发音，开始是一些简单的元音：“啊”“哦”之类的，后来就会发连贯的音，甚至会说话了。我记得清楚，他恢复发音后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正因为这，大家把他称之为我们身边的麦贤德：那六十年代著名的战斗英雄。在海战中创造了子弹射穿脑颅还高呼毛万岁奇迹的广东小伙子——再后来，董继平可以在同学搀扶下蹒跚学步：开始还好，同学们还在校，还能随时对他喂食，帮助他解便和洗澡，不久毕业分配，人去校空，这位“麦贤德似的英雄”境况就说不完的凄凉了。尤其糟糕的是，他竟开始恢复了记忆！分配外地的同学回校看他，这位“英雄”便会傻傻地说：家里还有老母亲啊！还等我毕业寄钱啊！说着还会流泪！开始，学校每月还支付他十来块生活费，后来，干脆就把他遣送回乡了事。同学们都在天南地北为自己的命运奔忙，他也就被慢慢忘却了。直到去年，我到四川公差，这才知道，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他，只能靠乞讨和拣拾垃圾堆里的食物为生，最后，不知什么时间，他终于倒在了岷江支流那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

关于这次战斗，一位亲历者：侯念平，就是将日记送给我作为素材的同学，曾对我作过这样的叙述：L大汉做了简单的动员，说：这一仗，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大家接着就冲上去了。我们是分三路上去的。正行进间，听冶金系纵队方向有人问：口令！不等回答，双方就交了火。我们是由“红农八一五”的人带上去的，突然发现前面有对方工事，大家急忙卧倒，紧接着从后面响起了炮声，炮弹呼呼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扑下身子回望，发现是空压厂的坦克在掩护我们进攻。对方工事很快被摧毁了，但我们还是不敢进攻，整个指挥一团糟，我们害怕坦克打了我们自己。一直等到坦克开走了，我们才向山头冲上去。上去了，对方战壕里还留下一架127（按：一种机枪，发射直径127毫米炮弹的）架子，枪管已经给扛走了，地下是一大滩血，估计枪手受伤撤退了。旁边还留了很多炮弹，刘文举，我们一起冲上来的同学，一看便高兴了，高兴得蹦起来——就在这时，正好一排子弹扫来，他大腿中弹，翻身倒地，鲜血涌流如泉。我们马上组织还击，把残敌打跑，这才急急把刘背下山去，到空压厂医务室找人紧急处理。

一个医生对刘的静脉注射一种叫右旋糖酐——据说是扩容的药剂——但不知弄错还是什么原因，注射成了酒精（是装右旋糖酐的空瓶，装的酒精）把刘拉回重大的时候，血管完全僵硬了。我们正围着尸体抱头痛哭，来了一个七军医大的女军人，告诉我们，说那医生很可能有意杀人。大家顿时盛怒难遏，提起枪就赶回去抓那个医生：那人已经跑掉了。

几十年后，我想，幸好那位医生跑了。如果不跑，文化革命的死亡簿上，肯定又会多添一具冤魂。

在这段笔记上，我还记了侯念平对我说到的另一个人：段亚伟，机械系四年级学生。侯告诉我，说段是在战斗中被对方抓住的，后来被拖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了。侯对我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呀，才是真正没有私心杂念的人呀。他说，我至今怀念他们！

段亚伟死后的情况我也至今记得清楚。同学们在广场上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并且把他的父亲和母亲也请来了。父母亲好像都是教师，而且好像也只有他这样一个儿子，茹苦含辛，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可以想象，儿子的死让他们很悲苦的。但是发言的母亲在会上没有象来自山区的李盛品母亲那样泣不成声，而更多些知识妇女的理性。她在发言中说了这样一些话：“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心爱的儿子，内心是非常悲痛的。但是我感到骄傲，因为培养子女的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她发言时的悲苦和庄严让我想起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那幅有名的《牺牲》：可怜的母亲用树枝一样枯瘦的手臂将自己的孩子举向冥冥中看不见的上帝。我们在《战报》

第43期刊登了追悼会的消息。时间是1967年10月9日。我想不起为什么这么晚才对他进行追悼？是不是一直没有能找到他的尸体？大字报也为他出了纪念专栏。我们把她母亲发言中关于为共产党培养了一个好儿子而骄傲这句话，写成了通栏大标语。

我曾经读过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人物伯尔的许多作品。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毁灭、忏悔和沉思，曾让我深深震动。现在我已不知道两位可敬的父亲母亲身在何方？如果还健在，我真想再见一见他们，和他们一起平静地讨论一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故事。因为很久以来，我就想把段亚伟和他母亲的故事写下来，我相信这个故事会和伯尔的故事一样动人心魄。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